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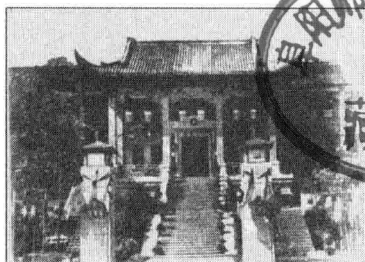
陪都重庆文化 与文学考论



郝明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陪都重庆文化 与文学考论



郝明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考论/郝明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61-5879-1

I. ①陪… II. ①郝… III. ①地方文学史—研究—重庆市
IV. ①I209.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64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闫 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的“西方之光”(代序)

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开始了全面的现代转型，随之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关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地方色彩”的诗思。只不过，“地方色彩”的诗思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从本土色彩到本地色彩的区分。

在这里，展开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本土色彩之思，所要追问的就是：外来现代文化与文学同本土传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这实际上首次触及中国文化与文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之中，是否出现了所谓的“断裂”现象。^①然而，无论是从新文化运动来看，还是从文学革命来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本土色彩一直保持着内在的连续性，即使是表现出从文化到文学在现代性影响之中趋向一致的文学启蒙，与“文以载道”之间具有基于文学工具性的本土延续，尽管两者的功利性意向存在着现代与传统之分。

然而，进行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本地色彩之思，所要追溯的则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同地方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事实上，传统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南北之分，已经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之中转向了东西之分。具体而言，也就是从古代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与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样的人文地理空间，转向了现代中国东方的沿海城市与西方的内陆城市这样的人文地理空间。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文学革命，都率先兴起于中国东方的沿海城市，无疑表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呈现出从东方到西方这样的人文地理空间的延伸，因而促使

^①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1923 年 6 月 10 日第 5 号。

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在从东到西一波又一波渐次拓展的同时，凸显出不同地方文化与文学在这一拓展中的本地色彩。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本地色彩之思，始于曾经生活在巴山蜀水这样的中国的“西方”，并且已经走向东方乃至世界的中国“西方人”，也就不足为怪了。毕竟是这样的中国“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尤其是随之出现的东西之分，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与沸腾的激情。^① 这个提出应该吟唱中国“西方”与“西方人”的诗人，就来自长江上游的内陆城市重庆。

这个诗人生于重庆长于重庆，不仅拥有巴蜀文化与文学这一历史悠久的本地资源，而且在中国现代化浪潮之中率先开埠，内陆城市的重庆由此而被视为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② 所有这一切，促使重庆向着现代城市快速成长，开始向世人展现出中国的“西方”之光。必须看到的是，由于重庆地处中国西方的内陆，无论是重庆的文化，还是重庆的文学，较之中国东方的沿海城市，都表现出现代转型的滞后性，因而在一段时间无法保持与整个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转型的同步，从而导致这一“西方之光”难以彰显出其固有的本地色彩来。

这样，如何才能赶上文化与文学现代转型的中国步伐，甚至能够率先走出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也就成为生活在中国“西方”的重庆人的最大心愿。这不仅需要相当的时间，也许更需要特定的机遇。当这样的时间与机遇能够在中国文化与文学转型的过程之中，现实地重叠在一起之时，也就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一旦把握住这一契机，或许就会出现奇迹，让中国“西方”的重庆文化与文学绚丽夺目，大放光彩，为中国“西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瞩目。

① 吴芳吉：《笼山曲·小引》，《新群》1920年第1卷第2期。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在如今被称为中国西部的地方，实际上在20世纪初尚被视为中国的“西方”，只不过，随着“西方”一词被逐渐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于是乎，就用中国西部来对中国的“西方”进行语用的替代。与此同时，中国的“东方”也逐渐被称为中国东部。

② 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其中规定重庆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91年重庆海关开关，重庆正式开埠，由此走上中国内陆城市的现代发展之路。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著：《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第22—23页。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文化与文学发生了区域分化,中国的东方出现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沦陷区,而中国的西方则出现了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战区。在这一区域分化的战时过程之中,中国文化与文学中心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东向西的战时转移,具体而言,也就是从中国东方的沿海城市迁徙到中国西方的内陆城市。正是这一中国文化与文学中心的西移,为地处中国西方的重庆文化与文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契机。然而,如何将这一历史契机转化为当下现实,不仅需要经受住严酷的战时考验,而且需要树立起抗战到底的坚强信念,更加需要进行民族精神的现代重建。

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客观上也促进了现代转型的全面展开。正如郭沫若当年所说的那样:“旧中国非经过一次大扫荡,新中国是不容易建设的。这大扫荡的工作,却由日本军部这大批蛆虫在替我们执行着了”,^①从而促使“民族复兴”成为抗战之中的中国现实。显而易见的是,“民族复兴的真谛”就是在从文化到文学的战时发展之中,既要“富于反侵略性”,更要“富于创造性”,进而趋于“富于同化力”,以便能够在汲取中外文化与文学的精华的现实过程之中,彰显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那厚积而绵长的地方色彩,以最终“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②。

尽管可以说郭沫若只是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战时发展这一基点,在指出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战时契机已经到来的同时,并没有能够看到中国文化与文学在战时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区域分化趋势,尤其是文化与文学的中国中心势必出现从东向西的转移。但是,郭沫若以诗人的敏感第一个揭示出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内在影响,并且提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加以言说。或许只是一个人的见解,在抗战烽烟激荡之际显得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因而只能在抗战区与沦陷区之间的持久对峙之中才得

① 郭沫若:《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作于1937年10月4日,后收入《羽书集》,1941年由孟夏出版社出版。

② 郭沫若:《民族复兴的真谛》,作于1938年12月23日,后收入《羽书集》,1941年由孟夏出版社出版。

以公开面世。

这无疑表明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战时契机固然是现实地存在着，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即使是在抗战区与沦陷区的逐渐分化之中，中国文化与文学中心从东向西的转移，也毕竟是为重庆文化与文学的战时发展提供了一种最大的可能性。如何使这一可能性成为重庆文化与文学的战时发展现实呢？事实上，在抗战建国的政略与抗战到底的战略之间趋向一致的持久抗战国策所形成的战时体制之中，重庆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对于国民党来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略的现实到全面侵略的可能，都不得不未雨绸缪。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事态的日渐扩大，国民政府被迫进行了战略的及时调整，“将全国形成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①于是，193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参谋团，由贺国光率队到达重庆，与四川省政府进行磋商，并且对重庆进行从行政、财政到金融、交通的全面考察。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参谋团奉国民政府令，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在1936年度的国防防卫计划中，最后确立以四川为对日作战的总根据地，重庆行营成立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1937年3月，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同年4月，四川省政府迁往成都，川军退出重庆，中央军进驻重庆。^②这就表明从19世纪末以来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的重庆，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为了应对战争风雨的即将来临，就已经被国民政府设定为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城市。

1937年的“七七事变”，证实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从局部反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反侵略战争。持久抗战的国策，随即进行了从战略到政略的全面调整。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须达到维护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②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著：《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第151—152页。

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① 这就在于,“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② 迁都重庆,促使地处中国“西方”的重庆开始走上城市现代化的战时之路。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令重庆由四川省政府直辖之乙种市改属为行政院院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市为国民政府陪都。^③ 陪都重庆在中国“西方”的出现,不仅加快了陪都重庆的城市现代化进程,而且推动了以大后方为主体的中国“西方”的文化发展。于是,在抗战前期,以西迁大后方的数百家工厂为骨干,以陪都重庆为中心,开始建构出较为完备的现代工业基础体系;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日机大轰炸出现的疏散区与迁建区,在客观上扩大了陪都重庆的市区,并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双重行政协调管理之中,加快了城市建设,奠定了陪都重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行政基础;尤其是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市民的文化素质也相应不断提高,各级人民团体大量出现,而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总部普遍设立在陪都重庆,大大有利于各项文化运动在陪都重庆的蓬勃开展,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不仅直接辐射到整个大后方,同时也间接扩散到沦陷区。^④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中、美、英等国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告全国军民书》、《告海外侨胞书》所宣称的那样——“自兹我中华民国已与全世界反侵略友邦联合一致,共同奋斗,誓必消灭日德意轴心侵略之暴力,达成我保卫世界人类文明之目的而后已。”这就表明,抗战后期的陪都重庆即将迎来向着国际大都市发展的历史契机。

尽管苏联政府在1941年12月8日发表声明,宣称苏联不会因为太平

①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1号,1937年12月1日。

②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讲演词》,《新华日报》1938年4月1日。

③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著:《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第167、172页。

④ 郝明工:《陪都文化论》,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9页。

洋战争的爆发,改变同年4月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所确立的苏日关系,但是,一大批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国家,先后对日宣战或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这些国家也成为《联合国家宣言》的主要签字国。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战争国家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在推动民族国家走向独立自决的同时,推进了民主化的世界进程。从此,“中日战争成为世界战争,两大阵营分明”。^①随后,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以废除历史上被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了1943年1月11日这一天,中国与美国在华盛顿、与英国在伦敦,同时签署了废除不平等旧约建立平等国家关系的新约,带动了其他有关国家迅速地与中国之间废除旧约与签订新约。这就从根本上恢复了中国的大国形象,进而确保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四强之一的国家地位,从而使中国得以在20世纪第一次展现出世界大国的姿态。

更为重要的是,在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民主浪潮,不仅各级人民团体的规模继续扩大,为推进民主化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且社会各界人士更是纷纷提出实现民主的具体主张,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样的民主化现实之中,随着《废止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令》的发布,陪都重庆出现了大量的图书、报刊,尤其是出现了众多作家创办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丛书,从一个侧面上显现出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迅猛发展。^②

可以说,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陪都重庆已经踏上了现代大都市的发展之路。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陪都重庆毕竟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战时体制下随着文化与文学的区域分化而走上现代都市化之路的。因此,在抗日战争迎来胜利之后,重庆也就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复员”大潮中,失去了必不可少的诸多文化与文学资源,而不得不黯然失色,为

^① 此时没有对日宣战的苏联,也是《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之一,不过,由于苏联与英国的反对,签字国前四名排序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改变为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然后其他国家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序。张弓等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412页。

^② 郝明工:《陪都文化论》,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76、207—212页。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与文学，尤其是区域文化与文学留下了一抹难以忘怀的“西方之光”。

或许从根本上看，也就在于：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这一中国的“西方之光”，正是因为其战时的辉煌，而最终成为抗战八年之间暂时出现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现象，从而揭示了民族国家之内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存在，至少是有其时间上的严格限定的。于是，由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这一现象出发，将会引发关于区域文化与文学中国存在，乃至世界各国存在的进一步普遍思考。

目 录

中国的“西方之光”(代序)	(1)
导言 区域的文化与区域的文学	(1)
一 文化与文学的区域分化及类型	(1)
二 中国的“西方”与文学的现代发展	(13)
第一章 陪都文化的空间绵延	(27)
一 巴蜀文化的流变	(27)
二 巴蜀文化的高地	(37)
三 陪都文化的肇起	(45)
四 陪都文化的建构	(54)
第二章 陪都重庆文学的战时拓展	(66)
一 陪都重庆文学与“重庆形象”变迁	(66)
二 陪都重庆文学的审美特征嬗变	(78)
三 小说史诗的双重建构	(90)
四 诗歌探索的多元趋向	(101)
五 话剧创作的两极互动	(114)
六 散文书写的个人姿态	(128)
七 文学思潮的主义论辩	(143)

第三章 重庆文学的现代运动·····	(154)
一 走向现代的文学·····	(154)
二 拥抱抗战的文学·····	(163)
三 立足政治的文学·····	(173)
四 守望改革的文学·····	(183)
余论 七月作者群在陪都·····	(195)
一 从《七月》到《希望》·····	(195)
二 七月诗派——“我是初来的”·····	(200)
三 路翎小说——“残酷的搏杀”·····	(205)
参考文献·····	(210)
跋·····	(212)

导言 区域的文化与区域的文学

一 文化与文学的区域分化及类型

何谓区域文化？何谓区域文学？从目前已经出现的有关研究成果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对区域分化中的文化现象，还是对区域分化中的文学现象，在相关的研究论著之中，通常更多的是从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与行政区划这两个层面上来加以确认的，致使对它们的学理把握呈现出某种学术偏至，由此而来，民族国家内出现的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也就常常被限制在所谓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单一层面上。导致如此学理偏至的一个直接原因，主要是没有能够从学理上区分大文化与小文化之间的概念差异。显然，这就需要从基本概念出发，来进行有关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的中国讨论。尽管这一讨论无疑是具有尝试性的学理探讨，但是，这一学理探讨同时更是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尝试，以试图建构具有普适性质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理论体系。

在这里，大文化是相对于小文化而言的，大文化即广义上的文化，而小文化即狭义上的文化，因而进行大文化与小文化之分，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对于人类文化进行整体认识。这就在于，文化生成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历时性变迁与共时性演变之中，以人类生活方式从历史到现实的互动发展来看，包括物质生活方式、群体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在内的人类生活方式，是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其整体性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说文化也就成为对于人类生活方式整体样态的学术性术语式指称，由此更进一步，大文化所指称的正是人类生活方式这一广义上的文化，而小文化所指称则是人类精神生活方式这一狭义上的文化，不仅大文化包容了小文化，而且

小文化更是成为大文化的基本构成,从而显现出大文化与小文化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大文化具有涵盖小文化的总体性,而小文化则体现出大文化的层次性。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叶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大文化观,展示了大文化的三个层面划分,并且推进了有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理论性思考。^①这就在实际上对与经济、政治相鼎足而立的狭义文化进行了理论区分。不过,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忽视了这一大文化观提出的历史语境,也导致了将文化仅仅限定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的政治误认。

梁启超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角度出发,较早提及文化的三层划分,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器物层、制度层、心理层这样的三个层面。^②从这样的大文化观出发,可以进一步看到,在文化的层次三分之中,文化每一层面上都呈现出两极化的构成向度:在器物层面上,呈现出生存方式与生产模式的两极区间,其间包容了从生活形态到生产方式的诸多变体,具有不同民族的具体文化样态;在制度层面上,呈现出群体规范与社会体制的两极区间,其间包容了从习俗体系到权力结构的诸多变体,具有不同民族的具体文化样态;在心理层面上,呈现出国民心态与主流意识的两极区间,其间包容了从族群记忆到世界观念的诸多变体,具有不同民族的具体文化样态。

这样,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在提出有关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原则同时所进行的相关讨论,^③将会给出这样的启示:从文化的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具有界于生存环境与族群素质之间的文化内涵,并且这一文化内涵空间的与日俱化,与时代的更迭是密不可分的,从而揭示出文化发展的横向性与纵向性,表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需要。由此而促成了必须立足于大文化观来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270页。

②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年4月),抱一编:《最后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版。

③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6—358页。

体性，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这样，而且在一国疆域内更是如此。

如果从大文化观的角度来看，区域文化只能是民族国家之内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显而易见的是，区域文化也同样具有发展的整体性需要，只不过，区域文化在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文化发展的横向性与纵向性的特定时空条件限制，因而促使区域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出现了历史性的构成二分，即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与此同时，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又可以进行二分，地域文化构成具有意识文化与地区文化的两重性，而地方文化构成则具有地缘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两重性。

区域文化之中的地域文化，作为促成区域性文化现象得以发生的构成要素，首先表现为意识文化，即区域文化的意识形态主流，其功能就是对区域文化进行意识调控，具有文化心理层中的主流意识与制度层中的社会体制这两者相融合的文化内涵，意识调控总是以政策性手段来进行的。其次表现为地区文化，即区域文化的政治行政区划，其功能就是对区域文化实施行政调控，具有文化制度层中的社会体制与器物层中的生产模式这两者相融合的文化内涵，行政调控一般是通过体制性手段来推行的。最后，在意识文化与地区文化之间，不仅文化内涵以社会体制为中心进行互动与互补，而且文化调控的政策性手段与体制性手段是在满足政治需要的前提下达成一致的，这就赋予地域文化以体制性的政治色彩。

区域文化之中的地方文化，作为导致区域性文化现象赖以出现的构成要素，首先显现为地缘文化，即区域文化的人文地理环境，其功能就是对区域文化提供资源支撑，具有器物层中的生存方式、制度层中的群体规范、心理层中的国民心态，这三者相融合的文化内涵，资源支撑通常是以地理边际为条件的。其次显现为民族文化，即区域文化的民族归属区分，其功能就是对区域文化提供生活导向，具有器物层中的生活形态、制度层中的习俗体系、心理层中的族群记忆，这三者相融合的文化内涵，生活导向通常是以民族归属为条件的。最后，在地缘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不仅文化内涵将会出现相互融通甚至重合，而且文化提供的地理条件与民族条件是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交融为一体的，这就给予地方文化以实存性

的民俗风貌。

于是，区域文化拥有了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这四大基本构成要素，而区域文化的二分，不仅体现出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区域文化的历史性发展，而且体现出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区域文化的总体性发展。与此同时，无论是包容着意识文化与地区文化的地域文化，还是包容着地缘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文化，已经成为区域文化的两大中介性构成要素，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两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在区域文化之间形成从意识形态主流到民族归属区分这样的多重性文化联系。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在此对区域文化进行第一次基于区域文化构成的描述性界定——区域文化是拥有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并且以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为中介形式的一种文化现象。

显然，如果进行区域文化的历史考察，就会看到区域文化作为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特定的时空规定性，也就是说，区域文化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时期之内，并且只能出现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也就是说，在区域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地域文化与特定的时期直接相关，因而表现出地域文化的时期性与波动性；而地方文化与特定的环境直接相关，因而表现出地方文化的持久性与累积性。

所谓地域文化的时期性与波动性，主要是指由于社会体制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动，所导致的意识文化与地区文化之间的体制性一致的形成与消解，从而促成了区域文化的形成与解体围绕着社会体制的变动而波动。地域文化的时期性与波动性特征，也就体现到意识文化特征与地区文化特征之中。

具体地说，首先就是意识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在文化意识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强化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的一致性，以进行意识形态的政策调控；其次也就是地区文化的行政区划限定性，在地区划分历史延续的前提下增进经济需要与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以进行行政区划的体制调控。如果说意识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更多地体现出地域文化的时期性，那么，地区文化的行政区划的限定性则更多地体现出地域文化的波动性。

所谓地方文化的长久性与累积性，主要是指由于群体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持续，所形成的地缘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实存性交融。一方面，文化交融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较为长久的历史过程，特定的地理条件为其提供了环境保障；另一方面，文化交融过程同时也是文化内涵不断丰厚起来的逐渐累积的现实过程，特定的民族条件为其提供了生活保障。地方文化的长久性与累积性特征，也就体现到地缘文化特征与民族文化特征中。

具体而言，首先就是地缘文化的人文地理稳定性，在地理条件的限制下，生存环境、群体规范、国民素质经过长期演变而密不可分，奠定了提供资源支撑的人文基础；其次是民族文化的民族归属独特性，在民族条件的限制下，生活风貌、习俗构成、族群原型经过逐渐演进而浑然一体，赋予了提供生活导向的民族特征。事实上，无论是地缘文化的人文地理稳定性，还是民族文化的民族归属独特性，对于如何体现出地方文化的长久性与累积性来说，尽管各有其侧重，但是，都离不开两者之间进行的相辅相成的融通，特别在两者出现重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必须看到的是，区域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划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只有在民族国家之内才能够得到完整地体现。这不仅在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一般不会出现类似地域文化的时期性与波动性的文化发展特征；而且也在于类似地方文化的长久性与累积性的文化发展，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一定会出现历史性的差异。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民族国家之内，区域文化的存在是相对而言的：首先是区域文化之间具有文化上的内在联系，其次是区域文化有可能成为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典范。这样，对于区域文化势必进行基于区域文化特征的描述性界定——区域文化是民族国家之内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中存在着的，具有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划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这四大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

最后，关于区域文化的初步界定就是：民族国家之内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中存在着的，拥有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具有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划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这四大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